

华人国际移民的历史回顾和社会学分析

周敏 (UCLA) 著 郭南 译

华人国际移民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开始涉足亚洲大陆以前，华人就已飘洋过海，到亚洲及世界的其他地方暂住或定居，寻求谋生机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华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一批又一批地从中国大陆移居海外，然后又从一个接收国再移居到其他的国家¹。据估计，现有超过三千三百万的华人生活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华人广泛分布在全球 151 个国家，其中 80%在亚洲（75%在东南亚），14%在美洲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间，华裔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730 万），泰国（640 万），马来西亚（550 万），新加坡（230 万）以及美国（290 万）³。如此大规模的华人国际移民潮印证了一句老话：“凡是海浪触到的地方就会有华人”。

本文根据对现有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分析⁴，对有关历史研究成果进行重新思考和探索，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以下的重要议题：即华人国际移民悠久的历史 and 已经形成并正在不断发展的全球华人移民社会网络和侨乡网络与更高层次的结构性的因素（殖民地化与反殖民地化，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国家政权更迭）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华人移民所产生的影响。同时本文也试图论述当代华人移民在母国和接收国的社会发展趋势。我认为从中国大陆涌现出来的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和这些移民在接收国暂住或定居后的再次移民，与历史、母国和接收国的经济、接收国的华人社区和社群、以及全球华人移民社会网络等因素的互动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宏观和微观的因素，决定了华人国际移民的性质、发展历程和方向。

一、海上贸易和华商经济的繁荣与前殖民时期的华人国际移民

在中国，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移民的性质和趋势颇为不同。中国历代王朝和政府对于移民政策及其影响也随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应该把移民问题放到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追寻由来已久的华人海上贸易和华商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际移民社会网络。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大规模地涌向亚洲地区和世界各地的移民潮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但华人移居海外则远在十二、三世纪就开始了。早期华人国际移民的模式大多是循环性的。华人移民暂时地背井离乡去经商贸易，或去寻求别的更好的谋生之路。在十二世纪以前，移民大多数只是在国内迁移，从乡下到邻近的乡镇和城市而很少移居别国。华人成批迁移海外大概在 12 世纪至 16 世纪之间，而主要前往中国近邻的亚洲各地⁵。当时的亚洲，除了华人以外几乎没有人敢漂洋过海，远离家乡。这一时期，出洋的大多是华商（贸易商，批发商和工匠），主要在东南

¹ Poston Dudley Jr., Michael Xinxiang Mao, and Mei-yu Yu,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round 199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 (3, 1994): 631-645; Laurence J. C. Ma and Carolyn Cartier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庄国土, 《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² Laurence J. C. Ma, "Space, Place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pp. 1-49 in Laurence J. C. Ma and Carolyn Cartier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丘立本, 《国际人口迁移与华侨华人研究》, 刊于郝志远主编的《海外华人研究论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2 年, 第 40-56 页。

³ Laurence J. C. Ma, "Space, Place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⁴ 本章由作者在英文原作基础上改写。英文原作: Min Zhou,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1 (1, 2006): 161-190.

⁵ 廖大珂, 《福建海外交通史》,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亚一带的国家地区经商。华商主导的移民是早期华人国际移民的主要模式⁶。在这一节中，我着重分析中国的海上贸易如何影响华人国际移民潮的走向，以及华商在东南亚的经济贸易活动对国际移民、尤其是亚洲洲际移民发展历程的影响。

十九世纪前的海上贸易

十九世纪以前，亚洲人之间的国际往来主要是向中国朝廷进贡的外国使团。另外还有一些商人，从事把热带产品销往中国以及把中国制造的产品卖到外国的商业活动。早在唐代时期（618-907），中国便是世界上最繁荣和强盛的国家。海上贸易高度发达，兴旺昌盛。那些敢冒险到海外去的华人被称作“唐人”⁷。公元1100年前后，华人把海上贸易从南中国海扩展到东南亚。中国人历史上称该地区为“南洋”。当时，中国朝廷和邻国朝鲜，缅甸，泰国，越南和琉球王国有着正式的贸易往来。同时，一些当地的官员和民间商人也通过一些东南亚的主要港口城市如阿优得亚，马六甲和文莱与外国商人进行交易⁸。当时菲律宾人和婆罗洲人还处在部落时代，他们试图把自己的领地转变成国家⁹。

海上贸易的鼎盛期在南宋时代。那时的瓷器，纺织品和漆器的生产和贸易十分繁荣。印刷出版技术极为发达。有关中国在东南亚和印度洋贸易往来的史书汗牛充栋¹⁰。蒙古人后来征服了中国，改朝代为元朝（1279-1368）。在元朝皇帝的统治下，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继续繁荣昌盛，贸易扩展到俄国和波斯。元朝廷鼓励与阿拉伯人通商，允许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同时也鼓励远征日本、爪哇、越南、柬埔寨和缅甸。除无法迫使日本和爪哇就范外，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都向元朝皇帝俯首称臣¹¹。元朝灭亡后，明朝皇帝（1368-1644）则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对外通商，控制海上贸易，限制外来影响。与此同时，明朝还不断侵吞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令其进贡，确立了其他周边国家从属于大明王朝的等级关系。

早在十七世纪初欧洲人涉足亚洲大陆之前，华人就控制了东南亚，即南洋大部分地区的贸易。在南洋，华商把很多东南亚的港口城市变成了贸易中心。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和制造业成品都在那里进行交易。与现代贸易不同，从前的那些贸易往来通常是面对面的交易，要求商人们自己带着商品去某地某市场进行交易。因而也使得他们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暂住¹²。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不发达，商人们要经常漂流海外，暂居一处，然后再移居别处，从事商业活动。因此，华商从中国到南洋的循环往复甚为普遍。他们通常会带着自己的工人短期到海外经商，然后回国，再准备下一次的旅程。十七世纪初荷兰人和英国人来到南洋地区，发现在那里的一些主要港口象文莱，马六甲，爪哇西部，巴达维亚，马尼拉，暹罗南部等地已有大批华人和成型的华人社区和社群。因此，前殖民时期的华人移民以华商为主，与海上贸易直接相关。他们所雇用的工人大部分都是亲戚或是同乡¹³。部分定居它国的商人成

⁶ G. W. Wang,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⁷ 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⁸ Anthony Rei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t. Leonard, NSW: Allen & Unwin for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1996).

⁹ Lynn Pan,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¹⁰ 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Pan, Lyn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曾绍聪，《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¹¹ Lynn Pa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¹²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¹³ G. W. Wang,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为为数不多的中介商人，把他们居住的地方变成了繁荣的集市，并主导和发展了中国和海外的贸易¹⁴。在这一时期，他们播下了后来的华人对外贸易和移民的种子。

中国历代王朝的角色

中国历代的王朝对于国际移民长期持模棱两可的态度。有时候支持向外移民，但却不鼓励他们回国。有时候又鼓励向外移民，热衷于吸引海外汇款。有时候却紧锁国门，完全禁止国际移民¹⁵。无论是处于繁荣还是萧条时期，中国历代政权在国际移民动向和国际移民潮的形成和发展中曾经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现在和将来亦会如此。例如，在明朝前期，朝廷严禁与非进贡国的贸易（例如与日本的贸易）和私人贸易，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变得极为困难，移民也因而受到极大的限制。后来，明朝虽放松了管制，但仍禁止子民海外定居¹⁶。随后的清朝（1644-1911），一如其前朝，对于华人移民海外仍抱敌对的态度，甚至要把敢于到海外经商或定居的子民处斩首极刑¹⁷。与外国人的通商仅限于广州一个港口。因此，早在十四世纪晚期的限制贸易制度实施之时，商人们就另辟蹊径，巧妙地避开政府的管制，为后来海外移民和华人社区和社群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例如，明朝皇帝限制与日本的贸易。为了逃避政府的管制，一些华商—大部分是福建商人，便到日本的港口城市，如长崎，长期定居下来。这些华商于是在福建、台湾和马尼拉之间开辟新的贸易路线，绕道进行海上商贸活动¹⁸。

1727年，清朝政府解除了大部分的海外私营贸易禁令。1754年，清朝第一次宣布允许守法的华人海外移民安全回国，并确保其财产受到保护¹⁹。即使有禁令，私人的对外贸易在中国南部和东南部还是非常繁荣，毫无减弱。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山高皇帝远”。这句话非常确切的形容了广东和福建的当地官员和商人的态度。十五世纪初期，中国商团就已经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岛扎根从商，生意兴旺。1567年，明朝将私人贸易合法化。于是多个新的东南亚港口城市应运而生，如菲律宾的马尼拉，越南南部的海安，柬埔寨的金边，马来亚的帕坦，西瓜哇的胡椒港和荷属港口巴达维亚等等²⁰。

国家移民政策的放松导致了华人海外贸易的繁荣发展。大批的华商、工人、农民、水手和各类冒险者纷纷外流²¹。与此同时，处在和平鼎盛时期的封建政府不断征服邻国。中国在1630年把朝鲜纳为进贡国，接着在1766年和1788年分别侵略了缅甸和越南。据记载，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朝鲜和东南亚等国每年要派使团两次至四次到中国向皇帝进贡²²。亚洲各国

¹⁴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¹⁵ 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

¹⁶ 曾绍聪，《东洋航路移民》。

¹⁷ 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曾绍聪，《东洋航路移民》；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

¹⁸ Syukushin Kyo, "Japan," pp. 332-339 in Lynn Pan,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曾绍聪，《东洋航路移民》。

¹⁹ Reid, Anthony, "Introduction," pp. 1-26 in Anthony Reid, ed., *The Last Stand of Asian Autonomies: Responses to Modernity in the Diverse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Korea, 1750-1900*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7).

²⁰ Lynn Pa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1999; V. Purce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Anthony Rei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²¹ Anthony Reid, "Introduction;" Anthony Reid,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Interactions," pp. 50-52 in Lynn Pan,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²² Anthony Reid, "Introduction."

之间的贸易和到中国进贡的外国使团人数在 1790 年达到顶峰，随后一直持续不断，直到 1840 年清朝的没落而逐渐下降。其时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者已经进入南洋地区。

总之，海上贸易和来华进贡使团的往来促进了华人向海外移民。当时移居海外的华人远远超过了移居中国的外国人人。在史学家安东尼·里德称之为“华人世纪”的 1740-1840 年，有近 100 万华人在东南亚定居，占当时本地人口的百分之三²³。十八世纪中，在邦加岛的华人估计有 3 万多²⁴。在 1810 年初的巴达维亚，华人占当地人口 10%²⁵。在 1820 年初的暹罗、爪哇和婆罗洲等地各有大约 10 万华人，占当地总人口的 46%至 65%²⁶。散居的华人移民在当地开始扎根。他们当中以商人为主，既是旅居者，又是定居者²⁷。例如，在曼谷从事海上贸易的 11,500 个水手中，全都是华裔²⁸。但是早期的华人移民并非所有都是商人。当定居的商人开始投资在农业，矿业和其他以土地为基础的产业时，他们大多从自己的家乡带来工人。那时大部分的移民来自广东省南部的潮州地区和福建的沿海地区。这些新移民起初一般都从事种植经济作物，生产糖、胡椒、槟榔膏、橡胶、以及从事锡矿和金矿的开采。大部分的产品由华商开发出来，主要提供给中国和国际市场²⁹。这些早年的华商大大加强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国际贸易联系，同时也影响和决定了接踵而来的中国海外移民潮的性质极其形成和发展历程。

二、中国王朝的没落与近代华人国际移民

十六世纪初，欧洲殖民者开始进入东南亚大陆和附近的岛国。西班牙于 1521 年占领了菲律宾群岛的中部，1571 年夺取了马尼拉，并将它的控制延伸到宿务岛和菲律宾群岛的其他岛屿³⁰。荷兰东印度公司则将群岛周围的分散的贸易区和贸易港变成了它的殖民地³¹。至十九世纪，西方殖民扩张达到顶峰。荷兰在 1799 年占领了印度尼西亚。英国在 1819 年占领并统治包括新加坡的马来半岛。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打败了中国，迫使中国开放口岸，把香港交由英国统治。从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³²。后来法国于 1864 年吞并交趾支

²³ Anthony Rei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Carl A. Trocki, "Chinese Pioneer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Southeast Asia," pp. 27-84 in Anthony Reid, ed., *The Last Stand of Asian Autonomies: Responses to Modernity in the Diverse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Korea, 1750-1900*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7).

²⁴ Barbara Watson Andaya, "Adapting t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Palembang in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pp. 187- 215 in Anthony Reid, ed., *The Last Stand of Asian Autonomies: Responses to Modernity in the Diverse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Korea, 1750-1900*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7).

²⁵ S. Abeyasekere, "Slaves in Batavia: Insights from a Slave Register," pp. 286-314 in Anthony Reid, ed., *Slavery, Bondage, and Dependency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p. 296.

²⁶ 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²⁷ Anthony Rei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²⁸ Anthony Reid,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Interactions."

²⁹ Carl A. Trocki, "Chinese Pioneer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Southeast Asia;" Edgar Wickberg, "Localism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Migr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35-55 in Gary G. Hamilton, ed., *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³⁰ Ian Brown,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 pp. 1011-1015 in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ia, 1999*, 13th edition (London: Europe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9).

³¹ Robert Cribb, "History [of Indonesia]," pp. 415-420 in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i, 1999*, 13th edition (London: Europe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9).

³² 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曾绍聪：《东洋航路移民》。

那（越南最南部的三个省），于 1885 年全部占领越南。还于 1883 年组成了包括柬埔寨和老挝的印度支那联邦³³。与此同时，一个长期闭关锁国的日本也开始奋起直追，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1894 年，日本在中日战争中击败中国，迫使中国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³⁴。

由于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西方的私营公司企业大量涌到被占领的新殖民地，发展农场，开采矿山，开发石油，大肆剥夺各种自然资源，然后在这些地区扩张市场。此时，欧洲殖民者开始从中国和临近的国家输入华工。这些华人合同劳工通常被称作苦力，从事农业、采矿和修桥开路等基础设施的沉重的体力劳动³⁵。这些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的变动，改变了移民的性质和进程。下面，我将讲述两次截然不同的中国移民潮的历史背景：一次是被招募到欧洲人统治下的东南亚殖民地的合同劳工；另一次是被招募到美国的劳工。

百年蒙羞与近代移民

在繁荣稳定的“中华世纪”（1740–1840）之后，中国人经历了失败蒙羞的百年。两次鸦片战争（1840–42 与英国；1856–60 与英法）的失败，加上严重的内乱，大清王朝元气大伤，导致其最终崩溃。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起因是由于 1839 年清朝政府没收了英国在广州仓库的鸦片。英国于是在 1840 年 2 月派遣战舰到广州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此战于 1842 年 8 月以《南京条约》的签订而结束。《南京条约》及次年签订的附加条约，强迫中国支付大量的赔款，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割让香港。这些不平等的条约还规定，在中国的英国公民如犯案必须由英国的法庭审理。同时还强迫中国把给予任何外国列强的特权同时必须给予所有其他的列强。

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动摇了清朝的根基。1856 年 10 月，广州的稽查登上英国船“箭号”，指控其船员走私。英国企图从中国得到更多的贸易特权，遂利用这一事件在 1856 年发动了一次更具侵略性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在法军的帮助下，次年取得了又一次快速的胜利，迫使中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使团常驻北京，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开放到中国内陆的旅行。当清政府拒绝批准该条约时，战火重燃。1860 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毁圆明园。清政府再次被迫签定该条约。随后又迫使清政府使鸦片进口合法化³⁶。

正当清政府与外国列强交战失败之时，南方的太平天国起义和其他地方一连串的农民起义运动，进一步削弱了清政府的势力，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太平天国起义（1851–64），由“上帝使者”、客家人洪秀全领导，是近代中国史上最出名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目标是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一个平等的国家。洪秀全来自广西省，自称为天国之王。他领导的部队打遍湖南，河北和长江沿岸，在 1853 年攻占了南京。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建立起一个夹杂着基督教信仰和古老中国的平均主义（平分田地）思想的政权。1864 年，清军在外国军队的帮助下，镇压了太平起义，攻陷南京，洪秀全自杀。长达 11 年的起义，近 2 千万人丧生，几乎倾覆了清王朝³⁷。

³³ Ralph Smith, “History [of Viet Nam],” pp. 1167-1170 in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ia*, 1999, 13th edition (London: Europe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9).

³⁴ Richard Storry, “History [of Japan] up to 1952,” pp. 462-465 in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ia*, 1999, 13th edition (London: Europe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9).

³⁵ G. W. Wang,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³⁶ Lynn Pa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World Book Encyclopedia* (Chicago: The World Book Inc., 1990).

³⁷ Lynn Pa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就在清朝迅速崩溃之时，亚洲另一强国——日本正在崛起，于 1890 年代中叶极力挑战、并最终击败清王朝。1894-95 的中日甲午战争，清朝几乎毫无抵抗就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殖民控制，并割让台湾。此后，英、法、德、俄等国相继强迫清朝出让更多的贸易特权，割让更多的领土。至此，中国有可能最终会被日本和西方列强瓜分成为两个殖民地。然而，中国国内不断发展壮大的民族主义运动，加上各国列强之间的相互竞争，使中国免于成为完全的殖民地³⁸。民间和政府的反抗团体组成秘密组织，反抗外国的、尤其是基督教的影响和征服。最出名的是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他们攻击西方传道士，杀“东洋鬼”（日本人）、“西洋鬼”（欧洲人）和中国的基督徒。义和团的反抗很快被西方八国联军所镇压。随后，部分清朝的官员企图效仿明治维新，推行新政，提倡改良经济，建立西式军队。但是，改革为时已晚，清朝最终在 1911 年覆灭。

清朝灭亡后，战乱和贫困有增无减。由国民党建立的新共和国势单力薄，无法统一中国，摆脱贫困和半殖民地化的困境。1921 年，新成立的共产党开始挑战国民党政权。军阀之间的内战愈演愈烈。1931 年，日本侵占中国满洲东北三省，使中国陷入了旷日持久的中日战争，直到二次大战结束。中日战争破坏了短暂维持的国共合作，使中国陷入了更大的动荡和苦难之中，面临毁灭的深渊。

伴随着清朝的衰败没落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西方列强和日本在亚太地区加速了推行殖民统治。这对中国的向外移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列强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扩张，打破了中国在亚洲地区内贸易的统治地位，改变了亚洲的出口经济模式，使亚洲与西方国家在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和工业原料的贸易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这种亚洲以外的新的东西方贸易机会，使数百年来主导了亚洲地区内贸易的华商变成成为欧洲殖民主义者的代理商或合作伙伴。这些商人后来在招募华人契约劳工时起了重要的作用³⁹。另一方面，新殖民地的工业，农业和矿业等产业的发展为海外华人移民社区和华商提供了机会。从做贸易扩展到投资种植农场和开采矿山，由此产生了对劳工的大量需求⁴⁰。大量的中国人口成为源源不断的劳工资源，历史悠久的华人移民社会网络，推动了劳工移民的浪潮。在中国国内，外来侵略和内部战乱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迫使人民背井离乡去寻找其他的活路。中国历来有向外移居以应付战乱和贫困的传统。沿海地区叫“走水”；北方地区叫“闯关东”⁴¹。不难理解，每当战乱频繁，改朝换代的时候，人们便大肆出逃。例如，1279 年蒙古人征服中国时，大量的华人便外逃到越南、柬埔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1644 年明清更替，也使大量难民外逃到东南亚的港口城市⁴²。然而，难民们的逃难大多是从农村跑到城市，大部分都是在省内流动。鲜有人愿意穿州跨省，从内地移居到沿海。更不用说飘洋过海，流落他乡。事实上，国际移民或难民并不总是源于经济最差，政治最乱，战事最频的地区⁴³。例如，几乎没有近代华人国际移民来自因太平天国失败而

³⁸ Lynn Pa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³⁹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⁴⁰ Lynn Pa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⁴¹ Ling Li, "Mass Migration within Chin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Emigration," pp. 23-47 in Paul J. Smith, ed., *Human Smuggling: Chinese Migrant Trafficking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s Immigration Tradition*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7).

⁴² Lynn Pa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⁴³ Jack A. Goldstone, "A Tsunami on the Horizon? The Potential fo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p. 48-75 in Paul J. Smith, ed., *Human Smuggling: Chinese Migrant Trafficking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s Immigration Tradition*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7).

沦陷的南京，因清朝被推翻的北京，土地贫瘠、黄河泛滥的河南，或是被日军占领的满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中国的国际移民主要来源于两个省份——东南部的福建省和南部的广东省⁴⁴。一小部分则是来自与越南接壤的广西省，与缅甸和老挝接壤的云南省。而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去韩国和日本的劳工，主要是日本殖民政府从东部的山东省征募的⁴⁵。

殖民时期涌向东南亚的移民潮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百年间，在中国产生了两股涌向东南亚的华人国际移民潮：一是以社会网络为动力的华商移民，二是以契约劳工为主的华工移民⁴⁶。前者大多沿袭了前殖民时期的模式，数量不大。后者则通称为苦力贸易，为数巨大。在殖民时期时期，在东南亚定居和做生意的华商和在那里的西方殖民主义者都拥有种植园和矿山⁴⁷。大部分的契约劳工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打工，但也有一部分为海外的华商打工。从移民的来源地和目的地来看，殖民时期与前殖民时期极为相似。

首先，殖民时期的华工移民以地区方言团体为基础。他们大多来自海上贸易发达、对外通商频繁的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这种相同的地缘关系揭示了近代移民潮与早期海外贸易潮之间的内在联系。如前所述，早期的华人移民大多来自广东和福建。根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调查，全世界大概有 2000 万的海外华人，其中有 1200 万居住在东南亚。在东南亚的华人中，68%（820 万）来自广东，32%（370 万）来自福建。这些移民并非平均分布在东南亚各国⁴⁸。在 1800 年，菲律宾的华人几乎全都来自福建。如今，85%-90% 华人后代的祖籍是福建，其余的大多数来自广东。在柬埔寨，早期的华人移民大多来自广东，潮州人占了多数⁴⁹。在马来西亚，华人中大多为客家人。相比之下，在北美、南美和西印度群岛，几乎所有的中国移民（99%）都来自广东⁵⁰。在同一个来源地区，移民主要来自几个相同的城市。具体来说，许多去东南亚的移民来自广东东部的潮州和汕头。然而，几乎所有去美国的华人都是来自广东的西南部——四邑地区。在泰国，95% 的华人移民或中泰混血儿来自潮汕地区⁵¹。在菲律宾，几乎所有广东移民都来自四邑地区。在美国排华法案时期的旧金山（又称三藩市），接近 75% 的华人来自台山（四邑地区的一部分）。

第二，殖民时期的华工移民大量涌向东南亚地区。而前往夏威夷、美国本土、西印度群岛、以及其他拉美地区的华工相对较少。在 1801 年到 1850 年间，估计有 63% 的华人移民到东南亚。而仅有 6% 到夏威夷和美国本土；5% 到西印度群岛；8% 到古巴和秘鲁。在随后的 25 年中（1851 年到 1875 年），虽然华工移民涌向夏威夷、美加和拉美地区的比例上升，涌入东南亚的数量仍然很大：27% 的华工移民到马来半岛；20% 到东印度；4% 到菲律宾。而仅有 17% 到夏威

⁴⁴ 曾绍聪，《东洋航路移民》；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⁴⁵ Lynn Pa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⁴⁶ G. W. Wang,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⁴⁷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⁴⁸ Guohong Zhu, *Overseas Emigration from China: A Historical Stud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⁴⁹ Edgar Wickberg, "Localism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Migr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⁵⁰ Lynn Pa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⁵¹ Walwipha Burusratanaphand, "Chinese Identity in Thailand,"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3 (1, 1995): 43-56; Kwok Bun Chan and Tong Chee Kiong, eds., *Alternate Identities: The Chinese of Contemporary Thailand* (Leiden and Singapore: Brill and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1).

夷、美国和加拿大；11%到古巴；9%到秘鲁⁵²。在 1876 年到 1900 年的美国排华期间，前往马来半岛的上升到 48%，到东印度的上升到 43%。而到夏威夷，美国和加拿大的则下降为不足 3%⁵³。到东南亚的华工移民有相当一部分在华人自己开的农场或矿山打工。

第三，近代移民潮伴随着大量的移民回流，移出和回流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循环移民潮。华人移民中的商人和劳工基本上都是暂居他国做临时工的男性。在中国的家族制中，男子无论排行如何都能平均继承遗产，而女子却不准离开家庭。这就造成了海外华人单身汉社会的形成。男性华工一般是离家打工，然后回国结婚，留下妻子在乡下照顾父母、孩子和田园。他们通常定期寄钱回国，期望不久可以衣锦还乡。商人们则有大部分时间停留在国外的暂住地以及在那里形成的华人社区，频繁来往于家乡和海外的经商寄居之地。但是在农场和矿山工作的华工却无法经常回国看望家人。尽管如此，回国的比例仍然相当高。例如，在 1882 年到 1905 年间，从泰国回流中国的比例为 57%。在 1906 年到 1917 年为 78%；在 1918 年到 1945 年间为 68%。但是在 1946 年到 1955 年间则下降为 40%⁵⁴。

前殖民时期华商移民与殖民时期华工移民的区别

分析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初殖民时期的华工移民，显示出早期的华商移民潮和近代的华工移民潮之间的历史关系。然而，殖民时期的华人移民与前殖民期的华人移民，存在着一些显著不同的特点。首先，在殖民时期，近代华人移民尽管大都来自于相同的地区（广东省和福建省），但是他们更多的不是为华商和华人老板打工，而是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做“苦力”，他们通常都是契约劳工或合同工。而在前殖民时期，华人移民大都是华商和华人老板的亲戚或乡亲，在华人老板开的商店、农场或矿山工作。

此外，尽管殖民时期的华人移民都是到前殖民时期相同的国家和地区，但他们更多是成批地出国，以满足那些国家和地区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在前殖民时期，移民潮总是伴随着商潮。华商由于贸易和在当地的对劳工的需求，很容易从自己家乡的村里乡亲中得到满足，因此华人移民与华商关系密切。此外，在殖民时期，一些地区需要大量的劳工从事农场种植，矿山开采和修桥建路，另一些地区却需求甚少。因此，即使在一些已有大量华人移入并建立了华人移民社区的国家和地区，华工移民的分布也是不平均的。例如，菲律宾、东印度和马来半岛吸引了 95% 去东南亚的华工。在高峰期（1851-1875），英国殖民地马来半岛上有 35 万华工。在荷兰殖民地的东印度有 25 万华工，在西班牙统治的菲律宾有 45 万华工⁵⁵。在 1923 至 1951 年间，约有 120 万的合同工去了越南（后来有 85 万回到中国）。而同期到法国统治的柬埔寨和老挝去的契约劳工或合同工则为数极少。

第三，劳工输出的方式不同。在前殖民时期，移民输出方式依靠由华商建立的、以家庭和同乡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在殖民时期，劳工移民的输出主要依靠两种方式—费用预付和劳务合同。很多华商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去招募劳工。他们不但招募自己乡下的同乡，也招募同一方言地区的乡亲。大部分苦力都是穷苦的、没受过教育的农民，无法支付移民的国际旅费。他们要么先向劳工中介以及亲戚或海外亲友借钱；或是签定劳务合同，从日后的工资中扣除。因此，并非人人都可以出国。只有那些与早期出洋的海外亲友和与移民社会网络有关系的人才能够出国。

⁵² W. Stewart, *Chinese Bondage in Peru: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olie in Peru, 1849-1874*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51).

⁵³ Guohong Zhu, *Overseas Emigration from China*.

⁵⁴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⁵⁵ Guohong Zhu, *Overseas Emigration from China*.

第四，殖民时期的劳工移民都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劳工从原籍地被运送到选定的港口，再大批被运到国外。例如，去马来西亚的中国劳工都先在澳门集中，然后再被运往海外。所以在马来半岛，不管这些劳工是潮汕人、福建人、客家人、广东人或海南人，当地人都称他们为澳门人⁵⁶。英国的劳工招募组织基本上是在香港、广州和汕头。与当地官员合作进行⁵⁷。那些到夏威夷和美国的劳工，大多在香港集中，然后乘船越洋前往目的地。

第五，虽然苦力劳工到了有华人社群存在的国家，许多人被迫要呆在农场或工棚中，不仅与当地社会隔离，也与当地的华人社区隔离。有些劳工穷困潦倒，无法寄钱回家，更无法回乡娶妻，传宗接代。因此，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华人劳工与当地的土著妇女通婚司空见惯。他们的后代(在菲律宾叫 *mestizos*；在泰国叫 *jeks*；在印度尼西亚叫 *peranakan*；在马来半岛叫 *babas* 或 *nyonya*；在越南叫 *sino-Viets*)后来大都融入当地的文化。但也有一些仍然保持华人的传统，融入海外的华人圈子⁵⁸。

总而言之，在殖民时期，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劳务输出国。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华人移民到亚洲各国。他们大部分是契约劳工或合同工。许多去东南亚的合同工在合同期满后都返回中国。但也有一部分留在接受国，融入当地的华人社区。这些移民进出的东南亚国家，都是处于西方殖民者统治之下的国家。例如，荷属东印度国家接受了 3 万名中国劳工移民。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又出资，使 3 万居民从爪哇移居到一些荒无人烟的外围岛屿⁵⁹。又如，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在 1850 到 1900 年间接收了 6 万 5 千名中国劳工。即使在 1898 年更换了殖民统治者，实施了限制华人移民法案以后，菲律宾仍然继续接收中国移民。而在同一时期，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被运往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去代替中国和日本劳工⁶⁰。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中国出去的移民大大减少。亚洲地区内的洲际移民也相对减少。

从中国涌向东南亚的移民潮经久不息，说明了中国当时国运衰败，也证明了历史悠久的华商移民网络所起的重要作用。尽管中国没有遭受任何外国的全面殖民统治，但政府对移民到西方殖民者统治下的东南亚国家、北美和拉美国家的华人契约劳工的管理毫无作为，根本没有能力去为国民争取公平合理的权益，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劳工免受剥削和虐待。中国政府的冷漠和无能间接增强了海外华人社群各种组织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些华人社群组织的产生，最初是要给寄居的华工提供帮助，保护他们免受外界的诸如排华情绪、暴力和不公平立法等的威胁和骚扰。同时也为保护华商及社区精英群体的经济利益。对于海外华人移民来说，华人精英及其社群组织在华人社区中所起的作用远比中国政府要大。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人移民的发展趋势

殖民统治的结束与移民管制的加强

从明朝末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约有超过一千万的华人从中国迁移到全球各地。其中约三分之二在东南亚扎根定居⁶¹。尽管西方殖民主义者还想继续维持其殖民统治，他们的殖民主义势力和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受到重创和重组。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战败，失去了它的“大东亚共荣圈”以及在亚洲的全部的殖民地。英国在二次大战后放弃了印度次大

⁵⁶ 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⁵⁷ Lynn Pa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⁵⁸ Lynn Pa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⁵⁹ Guohong Zhu, *Overseas Emigration from China*.

⁶⁰ H. B. Melendy, *Asians in America: Filipinos, Koreans, and East Indians* (Boston: Twayne, 1977).

⁶¹ 丘立本，《国际人口迁移与华侨华人研究》。

陆，但是依然控制着马来亚和香港。法国却重新控制了印度支那。荷兰凭借英国的支持，夺回对东印度的控制权⁶²。然而，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亚洲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在二次大战后开展了全面的、全民的民族主义运动，争取国家独立。美国也反对欧洲殖民主义在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在战后的十年中，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到老挝，纷纷倒塌，直到全部崩溃⁶³。西方殖民统治结束后，在这些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中，本土的保守势力，激进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派别相互争权夺利，希望掌权重建国家。他们加强戒备，紧守边界，阻止移民无限制的循环流动。结果直接影响到来自中国的国际移民潮。移民潮因而急剧减退。

二次大战后，中国国际移民潮的减退也与东亚地区的事态发展有关。1945年日本投降撤离中国后，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和在野的中国共产党相争，使中国陷于分裂状态。美国力促两党合作，调停失败，于是爆发国共内战。中共的部队奋勇作战，严守纪律，得到工农阶层的广泛支持。而国民党部队则无心恋战。再加上国民政府贪污腐化，国家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分崩离析，社会危机四伏，怨声载道。至使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失信于各社会阶层，甚至包括民族资本家，失去大势⁶⁴。国民党虽然拥有大量的美国装备，拥有绝对优势的制空权和大量的军队，共产党还是在1949年赢得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快被迫卷入了朝鲜战争。随后是长期的冷战。一直到七十年代末，中国被西方封锁，与外界完全隔离。中国和海外的华人社群也基本完全隔离。中国政府严禁任何形式的移民。非法越境者被视为犯罪。任何海外关系都被视为间谍和卖国，要遭受劳改或坐牢的惩罚。

国民党败阵后，带着二百万的军队和家眷撤到台湾，成立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从此开始了痛苦的“一国两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台湾）与“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民国）的论争和对峙。国民党退守到台湾后，长期坚持反对独立。在美国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下，国民党政府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包括土地改革、工业化、九年义务教育体系等等，迅速把台湾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然而，害怕共产党侵占的阴影笼罩日益加深。在五十年代，大量的大陆人从台湾移民到美国。从六十年代开始，台湾的大陆人和本土人的后代，得益于改革后的教育体系，开始来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使台湾学生在三十年中保持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之一。在六、七十年代，许多完成学业的台湾学生留在了美国。1972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1978年，中美正式建交。政局不稳导致大量的人才和资本流出台湾—主要流向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从某种意义上说，台湾是一个技术人才的出口地，而美国是它首选的目的地。

经济发展和当代亚洲洲际移民的趋势

二次大战后，东亚和东南亚的民族国家相继独立或重建。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重新排列组合。一方面，独立的民族国家要保护自己的主权，于是建立和加强了出入境的边界关卡，控制国内和国际的人口流动⁶⁵。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大力推行农业改革，发展工业，贯彻

⁶² Eniichiro Azuma, "Brief Historical Overview of Japanese Emigration, 1868-1998," pp. 6-8 in *International Nikkei Research Project, First-Year Report, 1998-99* (Los Angeles: Japanese American Museum, 1999); Robert Cribb, "History [of Indonesia]."

⁶³ Ian Brown,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 Robert Cribb, "History [of Indonesia]."

⁶⁴ C. P. Fitzgerald, *The Third China: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Angus & Robertson, 1965).

⁶⁵ Craeme G. Hugo, "The Demographic Underpinnings of Current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s in Asi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7 (1, 1998): 1-25.

实施富民强国策略⁶⁶。战后二十多年中，许多新独立的亚洲国家恢复了元气并迅速崛起。这些国家不仅与以西方发达经济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合为一体，而且还形成了新的亚洲经济中心。为了经济发展，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于 1967 年结盟，成立东盟。文莱在 1984 年，越南在 1995 年加入东盟。缅甸和老挝则在 1997 年加入⁶⁷。日本在 1970 年代成为亚洲的工业和金融超级大国。十年后，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经济起飞，令人瞩目，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和泰国急起直追，也成为新兴工业国。以日本为首，包括台湾，香港，韩国和东盟等新的亚洲联盟，为亚洲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向以美欧为中心的单极世界经济体系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亚洲洲际移民趋势自 1980 年代以来产生了质和量的变化。亚洲地区内相互依赖的经济贸易和投资结盟刺激了各国劳务市场对劳工的需求和各国政府对劳工移民的支持。日本，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文莱等成为典型的劳务输入国。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则成为主要的劳务输出国。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由于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成为既是劳务输出国，也是劳务输入国。从绝对数字看，日本是最大劳务输入国。但相对来说，日本的外国劳工比例较低。在日本，外国劳工只占全部劳动力的 2%，相对比韩国稍低一点（但日本的经济却比韩国的经济高 13 倍）。相比之下，外国劳工的在台湾的比例为 5%；香港为 13%；新加坡为 18%⁶⁸。

此外，香港和台湾的高薪吸引了许多亚洲其他国家的劳工。但在进口劳工的工种、数量、技能和来源国的移民和劳务输出政策等各方面，香港与其他劳动力短缺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如台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皆不相同。一般说来，劳动力大量输入香港和台湾是 1980 年代后期才出现的。在八十年代，香港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如制衣，玩具，家电，建筑等。加上生育率降低，因此产生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香港于是开始从国外引进劳工。与此同时，由于 1997 年香港回归中国，许多中产阶级惶恐不安，于是大量移居到澳大利亚和北美各国。这两股相反的移民潮相当引人注目。一股是要满足由于当地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力需求。菲律宾人是为数最多的外国劳力大军，约占全部外来劳工的 37%。大部分菲律宾的劳工都是受过教育的职业女性，但几乎全都是做家庭女佣⁶⁹。但是近年来在香港的家庭服务行业，印度尼西亚的低技能女工开始取代菲律宾女工。另一股则是拥有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来熟练劳工填补移居国外的中产阶级的空缺。在香港，几乎三分之一的外国劳力是来自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受过高教育的专业人士⁷⁰。近来，从中国大陆来的有外国学历或资历的高级专业人才也日渐增多。

台湾与香港一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刺激了劳工的需求。尽管有严格的移民法控制人口流动，台湾仍然比较大量地接受其他国家输入的劳工。但与香港不同，在台湾的外国劳工大部分是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来的低技能劳工。菲律宾妇女和印度尼

⁶⁶ Manolo I. Abella, "Contemporary Labor Migration from Asia: Policies and Perspectives of Sending Countries," pp. 263-278 in Mary M. Kritz, Lin Lean Lim, and Hania Zlotnik, e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s: A Global Approa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⁶⁷ C. Mary Turnbull, "History [of Singapore]," pp. 1053-1058 in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ia, 1999*, 13th edition (London: Europe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9).

⁶⁸ Craeme G. Hugo, "The Demographic Underpinnings of Current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s in Asia;" Philip L. Martin, Andrew Mason, and Ching-Lung Tsay, "Overview," *ASCEAN Economic Bulletin* 12 (12, 1995): 117-135.

⁶⁹ Sek-hong Ng and Grace O.M. Lee, "Hong Kong Labor Market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risis: Implications for Foreign Workers,"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7 (2-3, 1998): 171-186.

⁷⁰ Ronald Skeldon, "Labor Migration to Hong Kong," *ASCEAN Economic Bulletin* 12 (12, 1995): 201-218.

西亚妇女主要是做家庭女佣，而男工主要做建筑工人⁷¹。在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早期，由于受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中美正式建交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台湾也经历了中产阶级人才和资金大量涌到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移民潮，但在 80 年代中和 90 年代，许多台湾移民离开美国，重新返居台湾。回流台湾，跨国居住成为一种新趋势，从而减轻了人才外流的压力。虽然台湾严格控制移民，但有几个人口和经济的因素在相互作用而直接影响其移民模式：一是生育率降低；二是经济转型—从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转为资本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和金融服务业；三是政府在高速公路建设的投资。这些因素令台湾对国内低技能的工人，尤其是建筑工人的需求大为增加。在 19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台湾主要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引进制造业工人和建筑工人。从这两个国家输入的劳工占外国劳工的 70%以上⁷²。在台湾，除了护士和家庭佣人外，其他服务行业均不准引进外来工（在台湾约有一万三千名女佣）。自从中国在 1979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台湾在中国大量投资，海峡两岸的贸易日益繁荣。台湾还雇佣了许多中国渔民在海上作业，但是不允许他们在台湾上岸⁷³。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city-state）。领土小（641 平方公里），人口少，因此十分重视和仔细规划全球化的发展战略⁷⁴。新加坡在 1970 年代迅速崛起为新兴工业国，开始象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国一样，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人口零增长等问题的困扰。因此，政府制定了劳工输入优惠政策，大量引进外来劳工，无论是高技能或低技能的工人。政府允许两种类别的人员持不同的证件进入该国：劳工证和技工证。持劳工证的人一般是低技能的工人，他们不允许携带子女。如果是女性，则不准在新加坡生育。政府严格实施这些限制性的法令。而对那些持技工证的高技能的专业技术人员，政府则比较宽容。在 1985 年到 1994 十年间，进入该国的外来劳工从 10 万人增加到 30 万人。外来劳工所占的比例也从 1985 年的 8%上升到 1994 年的 18%。这些外来劳工主要来自马来西亚和泰国，也有一小部分来自菲律宾⁷⁵。在 90 年代以后，从中国和台湾来的高技能的专业技术人员日益增多⁷⁶。

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主要劳务输出国相比，中国似乎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劳务出口。由于长期的冷战使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绝。相对其巨大的人口基数，中国外流的国际移民显得微不足道。但是中国国内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使其具有极大的劳务输出的潜力⁷⁷。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亚洲处于高速发展的顶峰。中国也开始了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改革计划。首先是农业改革，然后是市场经济改革，接着是促进制造业出口和国营企业私营化的工业重整。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加上其潜在的人口数量和历史悠久的“竹子型华商网络”⁷⁸，改变了亚

⁷¹ Ching-lung Tsay, "Taiwan," *ASCEAN Economic Bulletin* 12 (12, 1995): 175-190.

⁷² Ching-lung Tsay, "Taiwan."

⁷³ Joseph S. Lee, "The Impac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n Foreign Workers in Japa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7 (2-3, 1998): 145-169.

⁷⁴ Soon-Beng Chew and Rosalind Chew, "Immigration and Foreign Labor in Singapore,"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12 (2, 1995): 191-200.

⁷⁵ Soon-Beng Chew and Rosalind Chew, "Immigration and Foreign Labor in Singapore."

⁷⁶ 刘宏, 《中国东南亚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Hong Liu, "New Migrants and the Revival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 (43, 2005): 291-316.

⁷⁷ Fred Arnold and Nasra M. Shah, "Asia's Labor Pipeline: An Overview," pp. 3-16 in Fred Arnold and Nasra M. Shah, eds., *Asian Labor Migration, Pipeline to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6); Jack A. Goldstone, "A Tsunami on the Horizon?"

⁷⁸ Murray Weidenbaum and Samuel Hughe, *The Bamboo Network: How Expatriate Chinese Entrepreneurs Are Creating a New Economic Superpower in Asia* (New York: Martin Kessler Books, 1996).

洲地区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平衡。其发展和趋势已经预示了一个“太平洋世纪”新时代的到来⁷⁹。这个时代的人员流动、速度、范围、方向和性质等方面与以往大不相同。

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大部分从中国到其他国家（尤其亚洲国家）的移民通常是借助于侨乡网络和海外移民网络小规模地暗中进行。迫于西方国家和邻国的压力，中国政府严格控制移民。但政府开始了恢复公派留学生的政策，也放松了对自费留学生的限制。由于中国政府不公开支持劳务输出，在韩国和日本的中国劳工大都是逾期不归的留学生或游客，属于非法居留。在那个时期，几乎没有中国劳工移民到亚洲其他的新兴工业国家。由于美国和加拿大放松了移民政策，从中国去北美的国际移民因此而大量增加。随着中国移民的不断增长，美国的华人人口从 1960 年的不足 24 万人迅速增加到 2000 年的将近 300 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⁸⁰。在加拿大，华人人口从 1961 年的不足六万人激增至 2001 年的将近一百万人。华人成为加拿大最大的非欧裔人种的族群，占该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⁸¹。事实上，汉语已成为加拿大第三大常用语言，仅次于英语和法语⁸²。中国的国际移民的潜力，以及亚洲地区内的洲际移民和跨大西洋的国际移民的新趋势，对亚洲和西方各发达国家如何管理和控制移民形成新的挑战⁸³。

非法华人移民

近年来在亚洲地区出现的大批洲际移民，大多是短期的循环劳工移民。他们中极少人能够获得长期定居权。劳务输出国和输入国的政府都积极参与管理外国劳工。然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使得政府对管理和控制移民的进出和流动越来越困难。在制定管理劳工移民的立法过程中，劳务输出国和输入国的政府都有意无意地为非法移民留下新的漏洞。中国就是一个突出例子。在 1950 年和 1980 年间，中国严格控制向外移民⁸⁴。自从中国在 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在推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无意中引发了国内和国际的移民潮。但中国不象其他亚洲劳务输出国，还没有一套完善的政府支持的管理移民的系统。自 80 年代末开始至今，中国移民在许多亚洲新兴工业国到处可见。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甚至东欧国家也屡见不鲜。在大批的中国移民中，至少有 10% 以上是非法移民。他们要么是逾期不归，要么是偷渡入境⁸⁵。

⁷⁹ Dean Forbes, "Toward the 'Pacific Century':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the Pacific Basin," pp. 35-43 in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ia, 1999*, 13th Edition, (London: Europe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9).

⁸⁰ Min Zhou, Wenhong Chen, and Guoxuan Cai, "Chinese Language Media and Immigrant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n Wanning Sun, ed., *Media and Chinese Diaspora: Community, Commerce and Consumption in Asia and Pacific* (New York: Routledge, forthcoming).

⁸¹ Peter Li, *Chinese in Canada*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⁸² Min Zhou, Wenhong Chen, and Guoxuan Cai, "Chinese Language Media and Immigrant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⁸³ Philip L. Martin, Andrew Mason, and Ching-Lung Tsay, "Overview."

⁸⁴ 庄国土,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⁸⁵ Ko-lin Chin, *Smuggled Chinese: Clandestine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李明欢, 《欧洲华侨华人史》; Willard H. Myers III, "Of Qinqing, Qinshu, Guanxi, and Shetou: The Dynamic Element of Chinese Irregular Population Movement," pp. 93-126 in Paul J. Smith, ed., *Human Smuggling: Chinese Migrant Trafficking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s Immigration Tradition*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7); Paul J. Smith, "Chinese Migrant Trafficking: A Global Challenge," pp. 1-22 in Paul J. Smith, ed., *Human Smuggling: Chinese Migrant Trafficking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s Immigration Tradition*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7).

在 90 年代期间，从中国合法出境的移民每年大约有 18 万人，但非法出境的人估计以每年 6 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在 90 年代后期达到 10 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每年有 20 万到 30 万人的净增长⁸⁶。假如亚洲国家吸收其中的四分之一，这些新兴工业国家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最想去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在亚洲，韩国和日本虽是主要目标，但通常只是作为暂时的落脚点，是再次移民的中转站。其他亚洲国家亦如此，常常被人口走私集团作为迂回输送非法移民的中转地。例如，“公海交换”就是迂回输送非法移民的策略之一⁸⁷。历史上，香港和澳门曾是中国海外移民的一个中转站。近年来，泰国和柬埔寨已经成为中国移民的目的地和中转站。通过这些国家，中国非法移民可以中转至北美、澳大利亚和欧洲⁸⁸。拉美国家，尤其是墨西哥，最近也已成为中国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一个重要中转基地。

日益明显和迅速增加的中国非法移民，究其根源，应该与中国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和由此引起的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转变直接相关。首先，工作的流动，社会福利的减少，如食品配额的取消，政府福利分房制度的取消等，使人们不必固守一地。禁锢的锁链一旦松绑，人们便可以自主地考虑选择向国内其他城市或向国外移民，以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⁸⁹。第二，经济的发展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增强了省地政府和官员的势力。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使有关系网、神通广大的人口走私集团如虎添翼。第三，全球各国历史悠久的华人移民社群组织，一旦和国内的侨乡故里重新互动，便能重新编织国际移民的网络，重整旗鼓，发挥作用。帮助亲戚朋友以旅游、留学、做生意和其他理由出国，满足部分非法移民的需要。第四，中国的人口走私集团和黑帮团伙勾结国外的人蛇组织，利用一些防守不严的边境地段的可乘之机，偷运人蛇出境，中转到外国⁹⁰。

许多移民接收国政府虽然都有严格的法律来管制非法移民的流动，但在处理非法移民的方式和态度上却有所不同。例如，有些亚洲国家认定这些中国非法移民是中国政府对该地区处心积虑的“非武力渗透”⁹¹。台湾认为中国的非法移民有妨害国家安全之虞。新加坡则担心中国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加上新加坡国内的人权组织和民主化对政府所持续施加的压力，会导致其移民管理体制的崩溃，使成千上万的移民和难民涌入新加坡⁹²。但事实上，如何控制和遣返非法移民，不仅取决于输入国政府的执行力度，也与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失业和就业程度，非法移民的社会网络以及政府劳务输出政策等等有关⁹³。由于输入国大量需要劳动力，遣返非法移民并非良策。基于经济规模，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以及移民的社会网络和非法人口走私集团等方面的因素，输入国对非法移民的遏制往往受到多方掣肘，难有成效。而输出国也因为受制于多方面的因素，如非法移民遣送回国，会使国内的失业恶化，并会导致国外汇款和外汇收入减少等等，难以采取积极有效的遏制行动⁹⁴。

⁸⁶ Jack A. Goldstone, "A Tsunami on the Horizon?"

⁸⁷ Paul J. Smith, "Chinese Migrant Trafficking," p. 8.

⁸⁸ Paul J. Smith, "Chinese Migrant Trafficking."

⁸⁹ Jack A. Goldstone, "A Tsunami on the Horizon?"

⁹⁰ Paul J. Smith, "Chinese Migrant Trafficking."

⁹¹ Paul J. Smith, "Chinese Migrant Trafficking," p. 14.

⁹² Paul J. Smith, "Chinese Migrant Trafficking."

⁹³ Patrick Pillai,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on Migrant Labor in Malaysia: Policy Implications,"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7 (2-3, 1998): 255-280.

⁹⁴ Joseph S. Lee, "The Impac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n Foreign Workers in Japan."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在亚洲和全球的移民，深受历史悠久的华人移民社会网络和侨乡网络，尤其是华商网络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各种地缘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殖民化和反殖民化，民族国家的建立，政权的更迭，民族经济发展计划等等。在前殖民化时期，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和中国在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和华商经济，直接影响了亚洲地区洲际移民的走向和性质。那时的国际移民模式基于国外使节来华向王朝进贡和华商出洋进行海上贸易。平民百姓极少大量漂洋过海，远离本土谋生。正是因为华人，尤其是商人和劳工在东南亚的经济贸易活动，导致了海外华人社群组织的发展和移民网络的建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中国对海外贸易和国际移民的限制和控制，使华人国际移民形成独具一格的模式；使海外华人的移民网络更趋于发达完善；使家乡民众和海外移民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从而导致了华人在东南亚以及全球的许多国家永久定居，成家立业。

西方殖民主义者涉足亚洲，结束了中国在贸易方面的主导地位，也终结了中国王朝的地缘政治中心的地位。借助于数百年来华商经济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贸易和移民网络，华商摇身变为劳工代理。他们避开政府的控制，使大批的中国劳工移民到亚洲或亚洲以外的西方殖民地国家。二次大战后，民族政权的建立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东亚和东南亚的地缘政治重新排列组合。冷战割断了中国和世界大部分地方的联系。在这段时期，新独立的亚洲国家积极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同时，他们加强边界的进出管制，执行严格的移民政策。当各国政府建立了管理移民进出的组织架构后，无论是输出国或者是接收国的华人社群组织，地下网络和移民中介机构都应运而生或重新活跃起来。这些华人组织与合法的或是非法的网络和组织有时会与政府配合，为解决经济的需要而帮助移民。但有时他们会自行其是，推动移民，而无需理会政府的支持或反对。另外，个人也可以借助于在各移民接收国已经长期存在的华人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的帮助，轻而易举地避开输出国和接收国的法律限制，达到自行移民到选定的接受国的目的。这些移民网络和移民社团组织和中介机构一经启动，完全可以削弱政府的管理权力，建立和经营国际移民的人口交易⁹⁵。

当今中国对外开放，实行经济改革，国际移民的压力也随之迅速增加。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直接的、但却是意料之外的结果，就是有组织的、半公开的非国际移民。显然，非法移民的趋势已经逐渐超出政府控制的范围，也逐渐超出市场经济自行调节的能力。在未来的 10 到 20 年间，这一现代的国际移民模式十分可能会继续下去。只可能有一种例外：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国，拥有最广泛、最强大和最完善的海外华人华侨社群组织，移民社会网络和侨乡网络，将成为一个深具潜力的劳力输出国。随着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的作用将受到削弱。由于中国人与海外的华人社群组织重新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移民潮（包括非法移民）将会重新定义“大中华世纪”。历史学家安东尼·瑞德曾经称 1740—1840 的百年为“大中华世纪”⁹⁶。新的“大中华世纪”将会使他所称的“大中华世纪”相形见绌。确切地说，中国的移民潮已经像正在形成的海浪，深不可测，势不可挡⁹⁷。这对于中国、亚洲和全世界来说，喜忧参半，焉知祸福。因此，目前中国和其他移民输出国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去管理、引导和控制移民。然而，国家的这种能力面临着相当大的局限：一

⁹⁵ Douglass S. Massey,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An 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ory: The North American Cas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 (4, 1994): 699-751.

⁹⁶ Anthony Rei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⁹⁷ Jack A. Goldstone, "A Tsunami on the Horizon?"; 丘立本, 《国际人口迁移与华侨华人研究》。

方面受制于经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受制于移民广泛的社会网络、侨乡网络和海内外的各种社会组织。